

导 论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对于今日中国的意义

所谓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一定时期为了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在客观分析国际形势和正确估量自己综合国力的基础上制定的对外谋略。它包括对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把握、国际战略环境的判断、对本国国力与国情的估计、对外谋略的筹划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维护国家利益是一国制定其国际战略的根本目标和指导思想，对世情和国情的正确判断是战略制定和实施的基础依据，对外谋略则是在国际战略指导下对外关系的原则体现。上述四方面构成了国际战略的一个比较完整的、统一的整体。

从对国际战略的基本认识出发，我们回过头来梳理邓小平留给中国的外交遗产，发现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了国际战略体系应该涵盖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从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在冷静观察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变化中的世界、世界中的中国、中国的外交谋略、战略制定的原则和方法等国际战略关注重大问题的总体认识和原则。从时代的主题、国际形势和格局发展到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从社会发展动力的考察到中国 21 世纪的发展、外交思路的设计等各个层面，为中国未来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

一、洞察国际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

国际环境是影响一国国际战略选择定位的外部条件的有机组合。对一定时期国际环境的动态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辩证的分析认识是一国走向世界的认识前提。邓小平对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战略环境进行了冷静的观察，深入思考了时代主题、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建立和国际社会发展动力等国际战略关注的一系列重大课题，形成了对国际形势判断富有时代精神的科学认识。

（一）世界大战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后，邓小平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重新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邓小平从世界这个大局而不是单纯以中国为中心来考虑世界重大问题，作出了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的判断。邓小平指出，由于维护和平的力量的增长大于战争力量的增长，维护世界和平是可能的。1985 年他又提出当代世界具有全球战略性意义的两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重要论断。

邓小平对时代转换以及转换时期的时代主题的正确认识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目标与战略选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是什么？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还是尽快实现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目标？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离不开当时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对反映世界发展主要矛盾和基本特征的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一直保持着传统的看法，认为战争不可避免。由于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封锁、包围的严峻形势下，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为宣传世界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基地。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 20 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只能是“战争与革命”所以列宁强调：“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他们就不能和平共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

期。资本家是会找借口来打仗的。”^①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实行的是一条和平的外交路线，强调“和平至上”^②但是面对着严峻的国际紧张形势，毛泽东主张用革命战争去反对反革命战争，提出要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以武力来保卫和平、以输出革命的形式来战胜资本主义成为当时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不得已的选择。

但是，随着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支撑列宁“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判断的基本条件发生了变化。列宁在1916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杀的世界体系。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发展，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最后必将以无产阶级革命和这一革命的胜利而告终”^③。但是战后，世界基本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没有出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形势，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也从战前争夺势力范围转向既竞争又合作的相对稳定发展状态，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斗争也随着前者的独立和解放转化为新的政治经济矛盾。各种矛盾关系的变化使得时代特征与时代主题发生转变。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邓小平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世界基本矛盾的变化，重新认识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环境，认定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1985年邓小平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

《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1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580页。

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①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的科学新论断，是客观分析世界形势及其矛盾运动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战后时代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未来趋势的高度概括。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一方面促使中国大胆地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标准，为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另一方面为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制度既矛盾斗争又共同发展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指明了道路。

（二）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动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世界未来走向何方？资本主义会不会一统天下？许多人对此忧心忡忡。1990年3月，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世界正处于两极格局走向终结，向多极化趋势发展的格局转换时期。他说：“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②对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认为其中有一个多种矛盾存在和多种力量重新组合问题，不要过于悲观。他说：“对国际形势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和大国关系的调整，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苏联解体后，建立在东西方力量平衡基础上的两极格局顷刻间被打破，国际关系处于空前的大变动之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毫无顾忌地运用它们在战后确立的国际旧经济秩序、运用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迫使弱小国家接受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制约，从而实现西方世界的经济霸权和政治强权，美国建立单极霸权的行动更是咄咄逼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发展趋势，究竟有何意义呢？应该看到，坚持世界未来走向多极有助于打破霸权主义控制世界事务的局面，拓宽各国在国际舞台上自由发展的生存空间，减少小国对大国、弱国对强国的单一依附现象。现在，美国通过强化美国的“一超”优势，使用各种方法将世界各国纳入美国领导的世界霸权体系。为此美国将世界各国分为四类，即“核心”国家、“转型”国家、“无赖”国家和“崩溃”国家。尽管美国对这四种类型国家运用的具体战略不同，例如通过巩固与扩大同盟的形式扩大“核心”国家的力量，通过打压结合的办法使“转型”国家彻底倒向美国；在打击“无赖”国家的同时重视与其对话，对行将“崩溃”的国家有选择地给予“援助”；对于像俄罗斯和社会主义中国这样的对手，采取了接触和遏制的两手政策，但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削弱主要对手的实力地位、运用强大的综合力量迫使弱小国家接受等方式将世界主要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面临一个要不要接受美国一极领导，如何判断世界政治格局的基本走势问题。面对西方化、美国化的强大压力，中国如果不全盘接受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全面领导，就必须对国际格局走向持鲜明的态度。

面对当前世界单极与多极力量激烈斗争的复杂局面，坚持世界走向多极的科学论断，而不是一有风吹草动就产生动摇，有利于我国执行独立自主、维护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困难环境中利用矛盾，打破西方国家对世界的主导与控制，抓住国际环境变化中的各种机遇发展自己。在多极化格局的形成过程中，中国以独立一极的身份发挥作用，也是社会主

义中国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应尽的责任，可以更加坚定、主动、有效地执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方针与政策。随着主张多极国家和国际组织力量的增长，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展空间必然被拓宽，这种趋势并不是某个超级大国所能阻挡的。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和原则

邓小平在长期的国际政治斗争实践中，一直在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在建立国际新秩序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20世纪80年代以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日益与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呼声相结合，发展中国家强烈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强权政治，反对少数大国控制世界，探索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日益被提上国际议事议程。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变化，及时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1988年，他在几次会见访华的外宾时都谈到：“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他说：“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①因为经得起考验，能够维持和平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邓小平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主张，为当前中国外交提出了一个符合世界发展客观要求和发展中国家切身利益的行动纲领。实事求是地提出一个国家特定阶段的外交行动纲领，需要我们以科学的精神、谨慎的态度、前瞻性的认识来把握。中苏论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提出了“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即“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283页。

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①的行动纲领，尽管这个口号非常鼓舞人心，但是并不符合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实践中也就难以有感召力。邓小平在 1990 年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讲：“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 包括政治关系 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②这样的外交行动纲领更符合当前实际，也是切实可行的。正因为如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公正合理国际新秩序的主张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新的国际体系中的共同议题和实际行动。

（四）科学技术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邓小平认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③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经济发展离不开科技，关键是科学技术 所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将生产力因素引入国际社会发展动力研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发展和国际社会发展中的核心位置，为我国制定发展战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理论基础的系统准备，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指引了一条正确的发展轨道。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一般原因和终极影响因素，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国际社

① 《学习文件汇编》第 3 集 北京出版社出版 第 21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53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83 页。

会发展的最强大、最持久、最根本的动力。但是在马克思以后的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一观点未被社会主义的实践者真正理解和掌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作为指导国内建设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视阶级斗争不仅是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惟一法宝，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20 世纪 70 年代，邓小平以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勇气和历史责任感重申和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国际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基本观点。

与此同时，邓小平还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和总结，及时准确地概括了以科学技术为先导的生产力因素在国际社会发展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位的作用，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命题。邓小平对国际社会发展动力的研究符合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基本规律。从 18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初发生的两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在全球确立奠定了基础；二战以后开始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改变了各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推动了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局面的出现，从而带来了国际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崭新局面。这一论断在当时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把人们从“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解放出来，回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一个富强中国的正确轨道。

二、在开放的世界中找寻中国发展的坐标

作为一个战略家，邓小平对国际战略的把握建立在对中国基础国情和综合国力的客观分析基础上，最终目标是通过改革开放之路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一极。国情、国力、发展道路、实现目标成为邓小平认识现实中国、制定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基本国力

国情研究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思考中 既有对“中国是个大国 又是个小国”这样的基础国情的认定，又有基于历史国情对实现祖国统一和富强的执著追求，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要求的思考。邓小平多次强调 要充分地、正确地认识我国的“国情”。中国现在还很贫穷落后 属于第三世界 是第三世界的一员 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他还强调：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在全面分析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在客观估量各种力量的地位作用之后 邓小平宣布 中国将是多极世界中独立的一极。中国的综合实力在世界上的位次呈上升趋势，但毕竟是一个尚未根本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低收入国家，这一状况大大限制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制约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 中国作为多极化中的一极 力量比较薄弱 只有不断地增强综合国力 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 才能大大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邓小平把中国国力的增强看成是维护中国国家权益和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和影响的根本途径。邓小平对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之所以有一个正确定位 离不开对中国国情、国力的准确判断。

中华民族有过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史，曾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独特贡献。然而从明朝中期到鸦片战争的 300 多年，由于闭关自守，使得中国这个曾在科学技术的许多方面领先世界的文明古国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尽管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好制度 但是由于我们犯了“左”的错误 拘泥于传统思想和前苏联模式，把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叫做“崇洋媚外”，结果许多人不仅不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面貌，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而且自以为自己了不起 关起门来 不顾社会发展的本来规律 不研究世界发展的潮流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导致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

要改变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这种僵死、教条的局面，改变“左”的思想对全民的思想禁锢，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承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承认中国总体国力尚弱、国民素质有待提高的基本现实，通过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全面开放的办法使中国社会融入世界，形成良性运行的机制。为此，邓小平一再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①“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②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全民的素质，在开放的世界里，通过不断地学习改进我们的社会生活。这是邓小平伟大实践给予中国社会发展的伟大真谛。

（二）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什么，如何解决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基本矛盾，这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思考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深入地研究中国多年的建设经验后指出：“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我们总结了经验，就是要对外开放，打破闭关自守，对内搞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这样，生产力发展不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③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①

今天我们已经毫无争议地接受这些思想，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的思考跨越了多少艰辛与思想障碍，是当代年轻人难以想像的。我们只举斯大林在谈到小农经济向大的农业经济过渡时的一段话加以比较。斯大林说：“这里两条道路，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向前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向后退到资本主义的道路。”除了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外，还有没有第三条道路呢？斯大林说：“所谓第三条道路，其实就是第二条道路，就是回到资本主义去的道路。”^②因为回到个体经济去和恢复富农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恢复富农盘剥，恢复富农对农民的剥削，使富农有权势。但是，能不能恢复富农而同时又保持苏维埃政权呢？不，不能。恢复富农的结果必然是成立富农政权而取消苏维埃政权，因而必然是成立资产阶级政府。成立资产阶级政府的结果又必然是恢复地主和资本家，恢复资本主义^③。在中国，尽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设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始终未能解决好这两对矛盾，甚至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社会主义航船一度偏离了发展生产力的主航道。

1984年中共中央作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引起世人瞩目，全世界各国要人、媒体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创举。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开端。今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时，由衷地感慨改革开放焕发了中国这块古老大地的青春活力，正是邓小平以伟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7页。

大战略家的胸襟和胆略 总体设计 , 一步一步推进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随着时间的推移 , 邓小平理论的威力和巨大作用还将不断地显示出来。

三、为中国外交把舵护航

邓小平为中国外交发展指明了一条规律性的认识。这个认识体系中既有对全局性问题的本质把握 , 也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具体操作办法 , 还有像“28字方针”这样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魅力的战术技巧把握。

(一) 规范中国外交总政策的核心内容, 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政策

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①为了更好地实行独立自主，邓小平提出要实行不结盟政策。邓小平把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了中国真正走向富强的道路；把和平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突破了过去“世界革命”的传统观念 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到与世界范围内所有国家发生关系，使这一原则成为发展中国家捍卫的国际法一般准则。同时，由于他注重维护国家主权的实效性和解决国际争端的实际互动性 提出了“一国两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等创造性命题，不仅开创了建国后中国外交的最好局面，而且为无序的国际社会昭示了新的前景和方向。邓小平对于人权与国权关系的认识，为中国应对国际社会复杂的人权斗争形势、捍卫中国的国家权利提供了基础性的理论思考。他把经济人权与政治人权有机统一起来，把解决人权问题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使我们在维护社会主义人权时有了坚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实的理论基础。

（二）帮助中国重新树立起崭新的和平外交形象

外交形象是一国通过其外交思想、政策和行为在国际社会留下的特定印象。一国的外交形象直接影响其外交目标的实现和外交行为的作用力。邓小平十分注意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他说：“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①当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长期以来由于对战争爆发过于绝对化的判断和极端革命的语言，在国际社会造成了中国好战的印象，“十年动乱”期间还发生了像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的恶性外交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国际影响。因此，1985年当中国宣布裁军百万时，人们以为又是一个大国在释放掩盖军备竞赛的烟幕弹。因为战后40多年里各国都在喊裁军，结果越裁军队越庞大，越裁军备竞赛越升级。但是当1986年“国际和平年”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总体上完成了裁减100万员额的战略目标，这是一个骇世之举，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原联邦德国《波恩评论报》评论道：“大家都在谈裁军，可是迄今为止只有中国人言行一致。”可见，如果没有邓小平对世界大战十几年内打不起来的判断支撑着，这一切是难以想像的。中国军队走上质量建军的道路，中国外交奉行真诚地与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和平形象逐步树立起来。

（三）为中国外交制定充满智慧、哲理和外交理念的“28字方针”

1989年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一年。东欧剧变、前苏联国内爆发全面危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1989年，西方对中国进行集体制裁，外交压力骤然增加，一时间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显得十分孤立和被动。在大转折、大变动、大动荡的国际背景下，如何为中国这艘巨轮导航，应该制定怎样的外交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

策略与方针，无疑是中国外交战略面临的一个相当尖锐、具有挑战性的重大课题。1989年9月邓小平在与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①在以后的几次讲话中，邓小平又陆续讲了几句话：善于藏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28个字被看成是邓小平在世界风云突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为中国外交制定的应对战术，也是指导中国外交走出历史困境，在国际斗争风浪中乘风破浪的锦囊妙计。

邓小平的28字方针使中国外交、中国的国际活动与斗争实践牢牢服从于国家发展这个大局，既善于斗争，又懂得妥协；既顾及眼前利益，更着眼于长远，区分对象、把握时机、讲究分寸和火候。28字方针在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精彩的生花之笔，其语言之精炼、思想之凝练达到高度完美的程度，其眼界之高远、胸襟之广阔更是令世人叹止。这一切都体现了邓小平沉稳坚毅、刚柔相济的独特魅力和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报国情怀。人们看到，中国外交和中华民族在国际交往中日益成熟、充满智慧。

（四）从中国崛起的“世情”和国情出发，向世人昭示：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当头

和平崛起是当前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庄重承诺，尽管这是中国高层首次用“和平崛起”描述中国的国家战略，但是这一思想并不是当今中国为了让世人接受自己的权益之计，而是中华文明与社会制度赋予中国的特殊禀赋。在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已经清晰地规范了对中国崛起和平属性的道路要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从战略的需求定位来看，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对国家崛起含义的特殊理解，寻找和平环境实现国家现代化是中国崛起的最大利益需求。（2）从战略的性质定位来看，“和平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为中国崛起目标规定的制度属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制度上、机制上保证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1页。

对和平追求的忠诚，“和平的社会主义”要创立的是一个走出传统大国崛起阴影的世界和平守护神形象。（3）从战略实现的途径定位来看，“永远不称霸”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也为中国在和平中发展、安全中受益，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目标选择了一条正确的路径。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既有对中国崛起的目标、属性的本质把握，也有对中国和平崛起具体问题的思考，这些认识是今天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实施极其可贵又具有可行性的思想财富，是邓小平为国家前途命运思考的又一辉煌之笔。

四、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和认识基础

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在和平与发展时代的继承和发展，是新中国几十年外交经验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理论的现实成果。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在邓小平的国际战略中始终得以体现，从邓小平对当今世界的认识到对中国国情的冷静分析，从邓小平对中国外交的基本定位到外交谋略的制定，这四大组成部分无一不是贯彻了捍卫国家利益这个核心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哲学思辨过程。

（一）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是在准确分析当代国际关系现实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关于国家利益的基本论述，始终围绕“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战略最高准则”这一基本命题展开。为此，邓小平从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三个方面把握国家利益的基本构成，并且提出了维护国家利益的三大原则：即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原则、各国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原则。他对国家利益三大要素的阐述以及三大原则的确立，突破了长期以来在国家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上的理论误区，无疑为三中全会以来在迷雾重重中寻找航标的我国外交工作指明了航向，成为邓小平国际战略科学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

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反映了国际关系的本质规律，即在一个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构成的国际现实社会中，各国都在争取和维护本国的自身利益，国家利益既是各国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又是其目标归宿。国家利益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始终存在着主观如何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的问题。邓小平的国家利益观与国家间关系的现实走向以及人类总体利益是一致的，他的思想不仅与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强权政治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且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的传统认识也有着本质不同。我们知道 无论是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盛行的年代 还是在戈尔巴乔夫片面强调‘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岁月里 国家利益不仅顽强地生长着，而且总在迫使人们为所犯错误付出代价。

（二）邓小平国际战略的哲学基础

当我们深入地体会邓小平的思想意境和他的价值世界时 我们看到 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贯穿于邓小平国际战略的始终。邓小平对变化中的世界、世界中的中国、中国的外交谋略这三大内容的论述 其思想认识基础在于 他总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中国民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国际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论断 设计和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战略。多年来 邓小平一直致力于打破习惯势力、主观偏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 研究国际新情况 解决外交新问题 使外交思想和中国对外工作的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判断和随时都在变化的世界发展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能够经受各种国际考验 具有中国特色、日渐成熟与完善的外交理念和思维 从而开创了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外交的全新局面。

邓小平十分强调在包括外交在内的一切实践活动中突出实事求是的行动意义 强调路线、方针、政策在理论向实践转变过程中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把实践当作人的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 反复强调‘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基本命题 对‘实际’‘事实’不仅当作客观事物去理解 而且当作实

践活动去理解，这就避免了再犯长期以来实事求是仅仅被作为思想原则，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被束之高阁的错误。这种错误认识曾经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中国在“大跃进”、“十年动乱”期间都犯了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作表面文章，喊唯心口号，唯领导是从，使中国社会发展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左”的思想盛行，大家都习惯于唱高调、讲套话的年代里，实事求是地为国家工作、为党工作是需要勇气和富有牺牲精神的。正是由于邓小平的这种精神才使得他的国际战略思想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感召力。

邓小平外交思想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本质特点。当今中国处于世界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同时又有着建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的特殊国情，这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建立在发达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全新体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态势、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并存、竞争……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是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构建中国外交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章中不可能找到，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中也找不到答案，邓小平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找到了答案。

邓小平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掌舵人，他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风格与作风直接影响着中国外交工作的发展态势和成败得失。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许许多多的民族英雄，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使命感，痛感中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态，希望通过迅速、彻底的社会变革来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但是，这些仁人志士往往不善于从世界历史进程的高度对中国国情、国力进行诊断，不善于从中国面临的现实困难和机遇出发，为中国找到一条切实的发展之路，这几乎成为中国历史发展抹不去的悲壮。可惜的是，在当代中国，邓小平不仅有强烈的报国情怀，而且十分清醒地、实事求是地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途命运放到世界